

李贽《说书》的文体辨析

屈彦奎, 任竞泽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陕西西安, 710119)

摘要:《说书》是晚明思想家李贽的重要著作之一。有些学者认为《说书》的文体是八股文, 并以此为据分析李贽对科举的态度。李贽《焚书》等有关文献对《说书》的描述显示《说书》的文体不似八股文。参照李贽《童心说》以“童心”作为肯定八股时文的前提, 分析李贽的科举经历以及晚明士人的心态, 结合《说书》的创作时间以及李贽本人的八股文创作能力, 并依据《说书》现存篇目的文体形态、《澹生堂藏书目》等目录学著作的归类以及顾大韶等人的评论, 可以肯定《说书》的文体形态为“说书”。李贽的《说书》应该是以文体命名的。《说书》文体形态的辨析有助于研究李贽对科举的态度, 进而研究李贽的儒学思想、文体学思想、心学思想以及文学思想。

关键词: 李贽; 《说书》; 文体; 说书; 八股文

中图分类号: I207.62

文献标识码: A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0)02-0174-08



晚明思想家李贽(1527—1602)一生之中有三部自鸣得意的重要著作, “《藏书》予一生精神所寄也, 《焚书》予一生事迹所寄也, 《说书》予一生学问所寄也”^[1](1635)]。《说书》又称《李氏说书》, 与《藏书》《焚书》不同, “《李氏说书》今已不存, 全貌无从窥探”^[2](187)]。研究者对《说书》是何种文体意见不一。部分学者认为《说书》的文体为八股文, 如张思齐先生认为“李贽《说书》两卷是其八股文的代表作, 它们在八股文的发展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3]; 黄强先生认为“李贽以《说书》中的四十四篇八股文实践了自己的理论主张, 寄寓自己的思想和学问”^[4]; 何新所先生认为“李贽自己也以时文格式写作讲学文章”, “时人也颇看重李贽的时文”^[5], 等等。部分学者认为《说书》应该是评解性文体, 如台湾学者邓克铭先生认为“李卓吾对《四书》之评解, 比较完整的著作应是《说书》与《四书评》”^[6]; 张建业先生及张岚先生则认为“《说书》内容是对《四书》的解说和评论”^[2](187)]。也有学者认为《说书》既有八股文又有其他文类, 如龚笃清先生认为《说书》“收集了他所作讲章及八股范文”^[7](347)]; 张荣刚先生认为“《说书》虽属于解经之书, 但其文体形式属于八股时文”^[8]。

我们认为“说书”是一种讲说书义的文体, 李贽《说书》的文体应为“说书”。现将理由胪列如下, 以供探讨。

一、《说书》文体争论的文献依据及辨析

李贽《说书》的真本可能已经亡佚, 现存《李氏说书》《四书评》《道古录》是否就是《说书》还有争议。众多学者对《说书》文体形态的辨析多依据间接文献。认为其为八股文体者多依据袁中道《李温陵传》、袁宗道《读〈孟子〉》、李维桢《续藏书序》及霍士廉《姚安县志》等。这些多为间接依据, 虽看上去数量众多, 实则值得斟酌之处。而李贽的《答焦漪园》《焚书·自序》等文献, 则可以帮助我们新的角度对李贽《说书》的文体进行辨析。

(一)《说书》的文体为八股文的文献依据尚需辨析

李贽未明确说过是以八股文写作《说书》的, 但后人认为《说书》的文体为八股文却并非偶然。其重要依据有袁中道、袁宗道、李维桢等人的相关表述,

收稿日期: 2019-05-22; 修回日期: 2019-12-26

基金项目: 2018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文献整理与研究”(18ZDA236);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生自由探索项目“晚明古文与时文辨体理论研究”(2018TS020)

作者简介: 屈彦奎(1982—), 男, 吉林松原人,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文论、中国古代文体学, 联系邮箱: quyanhui@126.com; 任竞泽(1968—), 男, 内蒙古赤峰人,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文论、中国古代文体学

所以我们首先要辨析其中是否存在疑点。

首先, 袁中道《李温陵传》中的“时义”一词不仅可指八股文, 也可以指“新义”; 既可以是文体, 也可以是思想。袁中道《李温陵传》云: “后以时义论圣贤深旨, 为《说书》。”^{[9](65)}论者以“时义”一词为《说书》是八股文体的依据, 而“时义”却还有其他含义。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尚书日记》云: “前有李维桢《序》称: ‘《书》有古文、今文, 今之解《书》者又有古义、时义。《书传会选》以下数十家, 是为古义。而经生科举之文不尽用。《书经大全》以下主蔡氏而为之说者, 坊肆所盛行亦数十家, 是为时义。’”^{[10](99)}将“古义”与“时义”对举, 是从时间上区分其含义, 接近“旧义”和“新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周易时义注》记载: “前有《自序》, 谓以明经获雋, 而烽火交江, 行路艰阻, 因坐卧小楼, 自为笺注, 大都自忧患中来。盖有托而为之, 故其言颇讥切时事云。”^{[10](68)}其作者章佐圣中明经科, 此书是“自为笺注”, 所以此书名中的“时义”应该不是八股文, 而是因“颇切时事”故称“时义”。因此, “后以时义论圣贤深旨”似可解释为“后来用时尚新义解释圣贤深奥的思想”。

其次, 袁宗道《读〈孟子〉》中的“四书义”也不是专指八股文, 且袁宗道未明确说此数十首“四书义”出自《说书》。袁宗道《白苏斋类集·说书类》卷十九《读〈孟子〉》云: “李卓吾先生有四书义数十首, 予最爱其《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篇, 后二股云: ‘心无时而不动, 故言之动即心之动, 初不待求之而后动也。既不待求之而后动矣, 而又何恶于求耶! 心无时而或动, 故言虽动而心不动, 而又岂求之所能动也。既非求之所能动矣, 而又何害于求耶!’ 看他彻的人, 出语自别。”^{[11](271)}四书义是一种与科举考试有关的文体, 同时也可指特定的考试内容。四书义与八股文是有区别的, 它产生于八股文定型之前, 而又使用于八股文被废除之后。《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五》已记载洪武考试之法, 大略损益前代之制, 初场四书疑问、本经义及四书义各一道, 而此时八股文尚未定型。《清史稿·志八十三》记载, “光绪二十四年, 湖广总督张之洞有变通科举之奏。二十七年, 乡、会试首场改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 二场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 三场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 其他考试例此”^{[12](3153)}, 这次变革废八股文而改用“四书义”。安东强先生指出, “若从文体正变的层面来考察, 四书义和五经义摆脱了八股程式的束缚”^[13], 则“四书义”又使用于八股文被废除之后。所以“四书义”从文体形态上看不能等同于八股文。但袁宗道所说“后二股”又为八股文之术语, 故此处袁氏引文必须确定出自《说书》才能得出

《说书》有八股文的结论, 而袁宗道并未明确说明。邓克铭先生认为, “其中‘四书义数十首’, 极可能就是前述李卓吾在《焚书》自序中所说之‘《说书》四十四篇’”^[6], 也属推测。论者以“李卓吾先生有四书义数十首”为依据认为袁宗道所指为《说书》, 也是推测而尚难确证。

再次, 李维桢《续藏书序》中所说的《说书》是否为真本尚无法确定, 而《姚安县志》所载《说书》应为伪书。李维桢《续藏书序》云: “《说书》以制义发孔、孟、曾、思之精蕴。”^{[14](359)}此处明确指认《说书》为“制义”之作, 即八股文之作。但是据李贽《焚书·自序》记载, 《说书》首次的刊刻时间大约在万历十七年(1589), 其后流传不广, 影响也远逊于《焚书》《藏书》。李贽的学生汪本铎续刻李氏遗作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 其间有很多假托李贽之名的伪作出现。焦竑在《李氏续焚书序》中说: “先生书既尽行, 假托者众, 识者病之。”^{[2](419)}汪本铎在《续刻李氏书序》中说: “海以内无不读先生之书者, 无不欲尽先生之书而读之者, 读之不已或并其伪亦读矣。”^{[2](421)}所以李维桢此时所见之《说书》是否为真本也难以确定。《姚安县志》记载: “《说书》者, 以制艺发孔、孟、曾、思之精蕴也, 书共六十八卷。”^{[15](317)}其说法与李维桢的说法相似, 但“书共六十八卷”与李贽《说书》的四十四篇书目又不符, 则县志作者所见《说书》或为伪作, 不能作为探讨此问题的依据。

(二) 李贽自述文献显示《说书》的文体不似八股文

以上几种文献作为《说书》文体为八股文的依据都有一定的疑问。更重要的是, 以上文献与李贽自己的记述相抵牾。李贽《答焦漪园》《焚书·自序》的描述显示《说书》的文体不似八股文。

首先, 李贽《答焦漪园》描述《说书》篇幅不长而且零散, 与八股文结体严谨完整相去甚远。李贽在给焦竑的信中说道: “又一种则因学士等不明题中大旨, 乘便写数句贻之, 积久成帙, 名曰《李氏说书》, 中间亦甚可观。如得数年未死, 将《语》《孟》逐节发明, 亦快人也。”^{[9](7)}“题中大旨”“乘便写数句贻之, 积久成帙”等表明李贽只是讲说题中的大义, 篇幅不长且比较零散, 不是完整严谨的篇章, 这和八股文文体要求结体严谨完整相去甚远, 倒是和“说书”文体相似。李贽欲将《论语》《孟子》逐节发明, 以八股文文体写作几乎不可能完成, 而事实也表明, 李贽并未完成此超级工程。

其次, 僵化的八股文体不适合李贽《说书》的写作目的。据《焚书·自序》记述, 李贽写作《说书》

有“发圣言之精蕴，阐日用之平常，可使读者一过目便知入圣之无难，出世之非假”^{[9](1)}的目的，这要求他以一种灵活的而不是僵化的文体进行创作。他认为“传注”“非以诱人，实以绝人”^{[9](1)}，又怎能选择更加僵化的八股文呢？“其为说，原于看朋友作时文”^{[9](1)}，是说他的写作源于看朋友做时文的启发，但并未说自己所写为时文(即八股文)。“亦佑时文”中“佑”无论解释为“借助”还是“帮助”，都会否定《说书》的文体为“时文”。若为“借助”，则“《说书》借助了时文文体，而不借助时文文体的也有很多”，这说明《说书》至少不全是八股时文；若为“帮助”，则“《说书》能帮助八股时文写作，而不能帮助的也很多”。

李贽自己的记述为辨析《说书》的文体形态提供了新的视角，但不能仅以此为据就得出结论。

二、李贽的八股文观念、创作能力与创作心态

李贽是否会以八股文的形式进行专题性的创作，还可以通过他的八股文观念、创作能力与创作心态来分析。文献显示，李贽对八股文一体并非盲目推崇，他“以时文为至文”，肯定八股文的前提是“童心”；李贽的科举经历表明其八股文写作能力并不突出；而李贽在考中举人三四十年之后再以八股文写作《说书》的创作动机也明显不足。

(一) 李贽以时文为至文的前提是“童心”

有学者认为李贽的科举观是矛盾的，他既反对假道学，又肯定八股时文。李贽在《童心说》中曾有“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的命题，又在《与汪鼎甫书》诸作中认为“原于看朋友做时文”的《说书》“是为千古绝唱，当与古文远垂不朽者也”^{[9](46)}，使人产生他极力推崇八股文的印象。何新所先生指出：“李贽对时文及科举制度的观点，就充满了矛盾。”^[5]此种矛盾让学者困惑，黄强先生考察游国恩《中国文学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李修生《中国文学史纲要》、余秋雨《戏剧理论史稿》等著作后发现，诸作对李贽在《童心说》中的“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的观念，或避而不谈，或“任意删去”^[4]。当代学者各抒己见，却莫衷一是。这就需要对《童心说》做仔细辨析。李贽对至文的论述是为“童心说”张本，而非简单地“以时文为至文”。其讨论“至文”的前提为“苟童心常存”。李贽认为若童心常存，就不会受“道理”“闻见”蒙蔽，而“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16](277)}。其后的论述认为各种文学体裁是“至文”皆本于“童心常存”这一前提，即

如果有“童心”，那么即使是举子业的时文，也可以称之为至文。张少康先生认为这表现了李贽强调“不能以时势先后论，只要出于童心，即使举子业也无可厚非”^{[17](199)}，可谓得之。黄强先生认为“李贽的八股文观已很清晰，其核心在于将‘童心’引入本意在于‘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4]，也堪称确论。

有学者认为，“李贽曾把‘今之举子业’的八股文看作是与诗歌、古文、戏曲、小说并列的天下至文”^[18]。若李贽“以时文为至文”，则需将时文与诗歌、戏剧、小说等文体进行比较，论证时文具有与其他文体近似的优越性，但李贽的论述之中并无此意。所以李贽不是从文体价值角度“以时文为至文”的，而是从思想内蕴“童心说”角度认为“以有童心之时文为至文”的。

(二) 李贽的八股文写作能力并不突出

李贽以横议而非以八股文闻名。清李光地《重修泉州府志》称：“夫泉僻处海滨，为九州风气裔末。然虚斋(即蔡清)以经解，锦泉(即傅夏器)、晋江(即李廷机)以制举业，李贽以横议，天下皆靡然宗之。”^{[19](310)}泉州诸多名士各有所长，李贽以横议闻名，符合其著作情况；不以八股文闻名，符合其科举经历。

李贽的著述情况显示其长于横议。汤显祖在《李氏全书总序》中评价他“李氏夙以书训世、经世、济世、骇世、应世、传世”^{[19](129)}；其论敌张问达说他的著作“狂诞悖戾，未易枚举，刺谬不经，不可不毁”^{[19](289)}。可见其思想活跃，擅长横议，这与其思想倾向也相符合。李贽在与耿定向的论辩之中也不落下风，《明史·耿定向传》记载“贽小有才，机辨，定向不能胜也”^{[20](5817)}，从中可以看出李贽擅长辩论。

与横议相比，李贽的八股文写作能力则逊色得多。其科举经历既不辉煌也不顺利，他只考中举人而未参加进士考试。在《卓吾论略》中李贽记述他七岁开始随其父学习读书作文，十二岁写下《老农老圃论》，虽受人称赞，但他自己对写八股文却越来越不感兴趣。他曾记述：

稍长，复愤愤，读传注不省，不能契朱夫子深心。因自怪，欲弃置不事。而闲甚，无以消岁月，乃叹曰：“此直戏耳。但剽窃得滥目足矣，主司岂一一能通孔圣精蕴者耶！”因取时文尖新可爱玩者，日诵数篇，临场得五百。题旨下，但作缮写誊录生，即高中矣。居士曰：“吾此幸不可再饶也。且吾父老，弟妹婚嫁各及时。”遂就禄。^{[9](84)}

李贽年轻时对八股文的认识是“此直戏耳”，认为八股文只是游戏，这已经显示了李贽对八股文写作的轻视态度。他考中举人是大量背诵时文然后进行誊录

甚至剽窃的结果, 中举后一方面他顾虑亲人, 另一方面认为无法再侥幸, 故未参加进士考试。这表明李贽对八股文态度上轻视, 能力上缺乏, 对自己的八股文创作信心不足。

(三) 李贽缺乏专题性写作八股文的动机

李贽年轻时“欲弃置不事”的八股文, 能否在其科举之后因感兴趣进而进行一种专题性写作呢? 这恐怕也不可能, 因为《说书》的成书时间在万历十七年(1589)左右, 距其考中举人时隔近四十年。明代虽有以八股文著称者, 如王鏊、钱福、孙鑄等人, 但是绝大多数士人在考中进士后都会对八股文弃而不顾。吴承学先生指出:“绝大多数文人都明白八股文是百无一用之文体, 但实际上又是他们取得功名利禄的最有用的工具。他们通常是骂八股文, 但又不得不研习八股文, 而一旦取得功名, 则过河拆桥, 鄙视八股文。”^[21]这样长的时间跨度很难让人相信李贽在中举后又对八股文产生兴趣, 并进行四十四篇八股文的专题性写作。后代对李贽的评价以及八股文的选本之中也未见推崇只考中举人的李贽的八股文。

八股文写得好不足取荣, 写不好适足取辱, 因而文人不愿专择八股文集结成书, 即使有也只是部分收录。若李贽将四十四篇八股文集结成书, 实属罕见。此外, 因八股文写作时文应该规范, 官方有固定程式供他人借鉴。想在科举考试之中获得好的成绩, 必须在平常的学习之中写作尽量规范的时文, 而不能以不规范的时文为榜样。平常尽量规范, 考场才能规范; 平常不规范, 考场多半不规范。而当时供士人模仿的程文多由官府颁布, 李贽没有写作程文的必要。

既然不为示范, 那么李贽能否为射利求名而私刻八股文呢? “成化年间是坊刻时文选本涌现之始”^[22], 至隆庆、万历年间, 书商私刻八股文风气正盛。蒋寅先生指出:“八股文通常不入文集, 试帖诗也不入诗集, 少数名家工为此体, 不忍自弃, 或坊贾射利, 往往单行其书。”^[23]李贽甚至曾为大中丞李公所选时文作《时文后序》, 但李贽为射利求名而私刻八股文的动机仍然不足。

首先, 从精神品格看, 李贽非射利之人。李贽主动辞官, 既不积蓄产业, 又无身家之累, 虽非大富大贵, 亦非饥寒交迫, 其衣食有靠不算缺钱。李贽赞赏鲁仲连“宁贫贱而轻世肆志”为“一生主意”^{[24](101)}, 追求“士贵为己, 务自适”^{[9](258)}, “大凡我书, 皆为快乐自己”^{[2](142)}, 其读书写作不是为钱。且“时文一道不切人事, 无益性情, 苟非设科取士, 则无一人为之矣”^[25]。李贽若为射利写作八股文, 有损性情, 与其“自适”“快乐自己”的精神追求不符。

其次, 从创作背景看, 追求科举、擅长八股之名对于身处耿李论战之中的李贽未必是好事。耿定向和李贽的论战始于1584年, 起因之一是耿定向批评李贽“因他超脱, 不以功名为重, 故害我家儿子”^{[9](37)}。耿李论战在文化界备受瞩目, 李贽已因“超脱”、不重功名被批评。若一边与耿定向论战, 一边大写八股文, 则耿定向批评失据, 而李贽则授人以柄。李贽的《说书》为自刻, 其自序说:“而恶自表暴, 又不肯借人以为重。”^{[9](62)}李贽与科名、文名甚重的焦竑、袁氏三兄弟等人友情深笃, 却未请他们作序借以为重, 而是低调地自序, 也不似求名。

再次, 从选文类型及读者对象看, 李贽的《说书》与坊刻八股文也存在诸多不同。一是晚明时期建宁、杭州、南京等地私刻八股文风气尤甚, 李贽自刻《说书》的地点在龙湖, 此地非风气中心。二是八股文“以选文来源与作者身份分类的八种选本”^[26]分别为程墨、房稿、行卷、社稿、朱(硃)卷、窗稿、名稿、乡会试录。李贽《说书》的文体与这八种选本均不符。三是李贽欲将《语》《孟》逐节发明, 不似坊刻八股要精选优秀作品的出版行为。四是李贽曾在1600年给汪本钊的信中提到“恐场事毕, 有好汉看我《说书》以作圣贤者, 未可知也”^{[2](140-141)}, 这说明其读者对象为科举已毕之人, 与八股文选本多为欲参加科举之人, 二者的读者对象不同。

因此, 无论从哪个方面讲, 李贽都缺乏写作四十四篇专题八股文并集结成书的必要。以八股文形式宣传自己的学说, 不是明智的选择; 以举人身份写八股文供人模仿, 说服力也不足。

三、李贽《说书》的文体为“说书”

辨析李贽《说书》的文体形态, 最好考察其原文。但李贽《说书》的特殊性在于其真本或已失传, 而其究竟是世传《李氏说书》《四书评》还是《道古录》, 还有争议。故而难以仅凭原文辨析其文体形态, 需要结合古代的目录著作对其的分类以及相关学者的评论。现存被认为是《说书》的作品的文体形态不似八股文而更接近“说书”。古代的书目类著作也将《说书》列为经部浅说类, 侧面支持其文体为“说书”。

(一) 现存被认为是《说书》的著作均不是八股文

八股文有比较固定的程式, 以程朱理学经义为指导, “代圣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 并逐渐形成了固定的结构, 即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收结”等部分组成。其要求“起

股、中股、后股、束股”使用整齐的排偶句式,所以叫八股,或者八比。其篇幅也有规定,既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吕思勉先生指出:“此等规则,虽亦小有出入,但原则上是始终遵守的。”^{[27](115)}八股文是一种比较好辨认的文体,是与不是,比较一下便知。现存被认为是李贽《说书》的著作的文体都不是八股文。

李贽《说书》一说为今传本《李氏说书》,郑振铎先生曾经论及此书而没有提出疑问^[28],崔文印先生则通过考证认为今传本《李氏说书》是拙劣的伪作^{[29](309)};二说为《四书评》,鄢烈山先生在《狂人李贽传》中持此说法^{[30](94)},而崔文印先生则认为《四书评》是叶昼假托之作^[31-32];三说为《道古录》,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即持此说^{[15](288)},今之学者如张思齐先生曾据此说对其进行整理点校并将《道古录》作为《说书》收入《八股文总论八种》^[3]。张建业先生主编《李贽全集注》则认为《说书》已经失传。可以确定为《说书》篇目的文章《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被李贽附录于给焦竑的信《复焦弱侯》中,我们可以借此考察《说书》的文体形态。

首先,《四书评》为评点之作,其文体不是八股文,无需赘述。

其次,《李氏说书》除去已经考证为伪作的部分,有六篇(《与友人书》《与焦弱侯》《兵食论》《答邓石阳》《答刘宪长》《童心说》)收于李贽的《焚书》和《藏书》^{[2](187)}中,其文体也不是八股文。以上文章有的写于《说书》刊刻之后,恰能证明今传本《李氏说书》为伪作,不足为凭。即使上述六篇为《说书》之篇目,其文体为“书”“论”“说”,也与八股文相去甚远。

最后,《道古录》文体亦非八股文。比如《道古录·第五章》,篇幅较长,无法全录,其内容体制概言之即以“用健曰”“予谓”“用健曰”“曰”两问两答对话的形式,讨论了《大学》之中“一是皆以修身为本”的问题。学生刘用健提问,老师李贽回答,这在八股文之中是没有的。从整体看,它不符合“代圣人立言”“代”的特征;从局部看,刘用健和李贽均使用了对偶的句子,但是同样不能称之为股对,至多能说是李贽无意识中带上了排偶的习气。《道古录》其他篇章大抵如此,均采用对话语录体的形式。

(二) 现存的《说书》作品的文体应是“说书”

考察李贽《说书》的现存篇目,似乎更能说明其文体为说书。说书是中国古代一种讲说书义的文体,它有北宋时文、经筵讲章以及民间解读书义等形态。李贽的《说书》应该与袁宗道《白苏斋类集·说书类》的文体相同,都属于解读书义的文体。

《说书》有一篇残存篇目,即李贽给焦竑的《复

焦弱侯》的《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张岱先生认为:“李贽用这句话作了一篇文章,收在《说书》里。”^{[16](117)}今录之如下:

近有《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说书》)一篇。世间人谁不说我能知人,然夫子独以为患,而帝尧独以为难,则世间自说能知人者,皆妄也。于问学上亲切,则能知人;能知人则能自知。是知人为自知之要务,故曰“我知言”,又曰“不知言,无以知人”也。于用世上亲切不虚,则自能知人;能知人由于能自知。是自知为知人之要务,故曰“知人则哲,能官人”,“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先务者,亲贤之谓也。亲贤者,知贤之谓也。自古明君贤相,孰不欲得贤而亲之,而卒所亲者皆不贤,则以不知其人之为不贤而妄以为贤而亲之也。故又曰“不知其人,可乎”。知人则不失人,不失人则天下安矣。此尧之所难,夫子大圣人之所深患者,而世人乃易视之。呜呼!亦何其猖狂不思之甚也!况乎以一时之喜怒,以一人之爱憎,而欲视天下高蹈远引之士,混俗和光之徒,皮毛奥秒之夫,如周丘其人者哉!故得位非难,立位最难。若但取一概顺己之侶,尊己之輩,则天下之士不来矣。今诵诗读书者有矣,果知人论世否也?平日视孟轲若不足心服,及至临时,恐未如彼“尚论”切实可用也。^{[16](111)}

这篇文章从整体上看缺乏八股文中“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股对”等基本结构。虽然有对偶句子,但是不能称为股对。因此这篇文章很难称之为八股文。

而此文更符合说书的文体特征。说书是一种讲说书义的文体。南宋吕祖谦在编《宋文鉴》时将苏轼《南省说书》选入,并将其归为说书一体,这标志着说书被正式确认为一种文体^{[33](1532)}。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也将说书列为一体^{[34](140)}。此后朱荃宰《文通》引用《文体明辨》序题,也收入说书一体。及至贺复征编辑《文章辨体汇选》,也持徐师曾之说。晚明之后又有许多以说书命名的著作,比较著名的有李贽的《李氏说书》、袁宗道《白苏斋类集·说书类》三卷。其他如明万历年间詹在泮的《说书随笔》、明天启年间陈天定的《陈氏说书》、明崇祯年间褚笈的《子云居说书》、明崇祯年间林宗仁的《林氏说书》、清康熙年间田雯的《蒙斋说书》、清雍正年间丁恺曾的《说书偶笔》、清乾隆年间张正笏的《说书唾余》、清同治年间陈震的《篋墅说书》、清光绪年间于振熙的《训蒙说书》、清陈凤友(一说是其妻多恭人,具体年代未详)的《素斋说书》等。现存可见的如袁宗道《白苏斋类集》以及清雍正丁恺曾的《说书偶笔》,都是典型的说书类

作品。

结合现存的各类说书作品及徐师曾在《文体明辨》中的总结,我们可以看出说书文体具有以下基本特征:内容多是针对经史作品进行书义讲说,没有独立题目,常以所解说的章节或语句为题,文体相对灵活,篇幅简短,或有问有答,或义明即止,时常伴有口语。《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多次用“故曰”“故又曰”解释词义,也是讲说书义;所引语句涉及《论语》《孟子》《尚书》等经典,应与《白苏斋类集·说书类》一样,同属于说书之体。

李贽《说书》应是以文体命名的,否则文体为八股文,而书名为说书,两相悖谬。

(三) 古代书目类著作将《说书》归为“经部浅说”类

李贽《说书》被《澹生堂藏书目》等一些古代书目类著作收录,并将其安排在“经部浅说”类,本身就是对其思想及文体的辨析,这种安排也符合说书的文体定位;而《李温陵集》的编者顾大韶对《说书》的评论,也支持其更符合说书的文体特征。

首先,《澹生堂藏书目》经部将北宋苏轼的《南省说书》、明代李贽的《李氏说书》和各类经筵讲章并列在一起,将其归为浅说类^[35]。《南省说书》被《宋文鉴》及《文体明辨》等列入说书一体,而《李氏说书》与《南省说书》并列,由此可见古人对李贽《李氏说书》的文体认识。

其次,《千顷堂书目》将《李氏说书》归为经部四书类,此类同列作品还有张居正的《四书直解》、罗汝芳的《四书一贯》、林兆恩的《四书正义》、徐渭的《四书解》等。《四书直解》是对四书内容的解说,现存于世,其文体不是八股文而是解说类文体应无疑问。

再次,《徐氏红雨楼书目》也将《李氏说书》收入经部。这些书目的收录方式反映了古人对《李氏说书》的文体认识。

最后,《李温陵集》的编者顾大韶虽未将《说书》选入,但是却对其思想和文体有过评论。他说:“《说书》数十篇,放于体而弱于辞,放于体而戾今,弱于辞而乖古,虽云理胜,未睹成章。”^{[15](200)}这是难得的从文体角度对《说书》进行的文体批评。顾大韶指出《说书》在文体上的“放”和文辞上的“弱”的毛病——“虽云理胜,未睹成章”,指出其思想上的长处和文体上不完整的短处,说明《说书》在文体上散乱。这与八股文有严格的体式要求不符合,却和现存各类说书作品文体灵活的特征相符合,可从侧面印证《说书》文体应为说书。

四、结语

综上所述,李贽《说书》的文体之所以困扰诸多学者,既与《说书》真本未流传下来有关,也与诸多文献相互抵牾有关。通过分析李贽的八股文观念、科举经历、八股文创作能力,根据对被认为是《说书》的著作以及现存李贽《说书》篇目的文体形态考察,结合《澹生堂藏书目》等对《李氏说书》的归类,可以看出李贽《说书》应是以文体命名的,其文体应该和晚明时期很多类似作品一样是说书。探析李贽《说书》的真伪及文体形态对李贽研究乃至晚明的文学及思想研究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首先,李贽的儒学思想。《说书》作为李贽对儒家经典的解说,其写作时间正处于耿李论战的关键时期,即李贽“异端”思想的形成期。准确把握《说书》的文体形态及思想内涵,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李贽的思想,如李贽对科举的态度及李贽对儒家思想的阐释等。

其次,李贽的心学思想。《说书》的思想或许受到心学思想的启发,借讲说儒家经典书义来阐发心学思想。李贽在给焦竑的信中说道:“有《出门如见大宾篇》(《说书》),附往请教,尚有《精一》题《圣贤所以尽其性》题未写出,容后录奉”^{[16](110)}。而王阳明《传习录·徐爱录》之中亦曾探讨“精一”“尽心知性”的话题,如“但朱子之训,其于《书》之‘精一’,《论语》之‘博约’,《孟子》之‘尽心知性’,皆有所证据。以是未能释然”^{[36](12)}。李贽未写之二题与此是否为巧合,抑或来源于此?其时焦竑已中状元,李贽无需科举,所请教者应不是讨论如何写作八股文,那是否在探讨心学思想?

再次,李贽的文体学思想。李贽对不同的文体有何认识?为传播思想而选择相对灵活自由的文体,这种文体选择是否体现了李贽体为用选的文体学思想?王阳明曾提出“夫体用一源也,知体之所以为用,则知用之所以为体者矣”的文体学思想^{[37](586)}。李贽的体用思想和王阳明的“体用一源”思想是否有联系?

最后,李贽的文学思想。说书一体常伴有口语,顾大韶评《说书》“弱于辞”,薛冈评价李贽文章“其所为文,皆恒入俗话,仅加之乎者也而已”^{[19](248)}。若《说书》有此特点,则李贽对“口语”“俗话”写作是何态度?李贽《说书》是否影响了袁宗道的说书写作,二者有无联系?其对语言的态度是否影响了袁宏道的公安体?袁宏道提倡卑靡浅俚之体、戏谑嘲笑、间杂俚语,这与李贽的语言态度是否有联系?

《焚书》《藏书》研究已经深入而广泛,但《说书》的研究却尚待深入。一部《说书》,让多少学者费尽思量,或许有一天,《说书》真本重现于世,这些问题能更好地解决,则李贽幸甚,中华文化幸甚。

参考文献:

- [1] 袁宏道. 袁宏道集笺校[M]. 钱伯城, 笺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YUAN Hongdao. Notes to the collection of works of Yuan Hongdao[M]. Qian Bocheng, note.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81.
- [2] 李贽. 李贽全集注: 第三册[M]. 张建业, 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LI Zhi. Notes to the complete works of Li Zhi: Vol 3[M]. Zhang Jianye, eds.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0.
- [3] 张思齐. 李贽《说书》与明代八股文[J].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4): 16-21.
ZHANG Siqi. Li Zhi's *Shuoshu* and the Eight-Part Essays of Ming Dynasty[J]. Journal of Xihua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2009(4): 16-21.
- [4] 黄强. 论李贽的八股文观及其实践[J]. 扬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4(4): 1-6.
HUANG Qiang. On LI Zhi's viewpoint of the Eight-Part Essay and his personal practice[J]. Journal of Yangzhou College of Education, 2004(4): 1-6.
- [5] 何新所. 李贽时文观辨析[J]. 泉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2(1): 108-111.
HE Xinsuo. Analysis of Li zhi's shiwen viewpoint[J]. Journal of Quanzhou Normal College(Social Science), 2002(1): 108-111.
- [6] 邓克铭. 李卓吾四书评解之特色: 以“无物”、“无己”为中心[J]. 文与哲, 2008(13): 91-120.
DENG Keming. The features of Lee Chaowu's commentary on the four books: Focusing on the conception of objectlessness and subjectlessness[J]. Literature & Philosophy, 2008(13): 91-120.
- [7] 龚笃清. 明代八股文史[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5.
GONG Duqing. The history of the Eight-Part Essays in Ming Dynasty[M]. Changsha: Yuelu Press, 2015.
- [8] 张荣刚. 晚明王学视域下的“以时文为古文”现象[J]. 凯里学院学报, 2018(4): 75-79.
ZHANG Ronggang. The phenomenon of taking popular prose style as the ancient on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y of Wang Yangming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J]. Journal of Kaili University, 2018(4): 75-79.
- [9] 李贽. 焚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LI Zhi. Burn book[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9.
- [10] 永瑤, 等.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YONG Rong, et al. General contents of Siku Quanshu[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5.
- [11] 袁宗道. 白苏斋类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YUAN Zongdao. Collection of Baisuzhai[M].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89.
- [12] 赵尔巽. 清史稿[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ZHAO Erxun. Draft history of Qing[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7.
- [13] 安东强. 清末废八股后的四书义与五经义[J]. 文学遗产, 2015(5): 45-54.
AN Dongqiang. The Sishuyi and Wujingyi after the abolition of the Eight-Part Essay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J]. Literary Heritage, 2015(5): 45-54.
- [14] 李贽. 李贽全集注: 第十一册[M]. 张建业, 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LI Zhi. Notes to the complete works of Li Zhi: Volume 11[M]. Zhang Jianye, eds.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0.
- [15] 张建业. 李贽研究资料汇编[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ZHANG Jianye. Collection of Li Zhi's research materials[M].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3.
- [16] 李贽. 李贽全集注: 第一册[M]. 张建业, 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LI Zhi. Notes to the complete works of Li Zhi: Volume 1[M]. Zhang Jianye, eds.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0.
- [17] 张少康.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 下册[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ZHANG Shaokang. History of theoretical criticism of Chinese literature: Vol II[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5.
- [18] 林红, 李晓梅. 明代八股时文与文学的融通[J]. 长春大学学报, 2007(3): 35-38.
LIN Hong, LI Xiaomei.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Eight-Legged Essay of the Ming period and literature[J]. Journal of Changchun University, 2007(3): 35-38.
- [19] 李贽. 李贽全集注: 第二十六册[M]. 张建业, 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LI Zhi. Notes to the complete works of Li Zhi: Volume 26[M]. Zhang Jianye, eds.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0.
- [20] 张廷玉. 明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ZHANG Tingyu. Ming history[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4.
- [21] 吴承学. 简论八股文对文学创作与文人心态的影响[J]. 文艺理论研究, 2000(6): 79-85.
WU Chengxue.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Eight-Part Essay on literary creation and literati's mentality[J].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2000(6): 79-85.
- [22] 胡海义. 八股文考论三题[J]. 中国文学研究, 2016(3): 58-61.

- HU Haiyi. Three arguments about stereotyped writing[J]. *Research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16(3): 58–61.
- [23] 蒋寅. 科举阴影中的明清文学生态[J]. *文学遗产*, 2004(1): 18–32, 158.
- JIANG Yin. The ecosystem of the Ming and Qing literature under the shadow of imperial exam[J]. *Literary Heritage*, 2004(1): 18–32, 158.
- [24] 李贽. 李贽全集注: 第五册[M]. 张建业, 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 LI Zhi. Notes to the complete works of Li Zhi: Volume 5[M]. Zhang Jianye, eds.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0.
- [25] 申颀. 耐俗轩课儿文训[M]. 清刊本.
- SHEN Ting. Guidelines for children's education of Naisuxuan[M]. Qing Dynasty Edition.
- [26] 胡海义. 八股文选本类型考析[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8(1): 106–110.
- HU Haiyi. Study on types of the Eight-Part Essay anthologies[J].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2018(1): 106–110.
- [27] 吕思勉. 中国通史[M]. 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2.
- LV Simian.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M]. Beijing: China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 2012.
- [28] 陈福康. 郑振铎《求书日录》佚稿[J]. *文献*, 2005(1): 171–192.
- CHEN Fukang. *The Diary of Collecting Books* written by Zheng Zhenduo[J]. *Documents*, 2005(1): 171–192.
- [29] 中国哲学编辑部. 中国哲学: 第一辑[C]// 上海: 三联书店, 1979.
-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Chinese Philosophy. Chinese philosophy: Part I[C]//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 [30] 鄢烈山. 威风悲歌: 狂人李贽传[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2.
- YAN Lieshan. Biography of Li Zhi[M]. Guangzhou: Guang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2.
- [31] 崔文印. 《四书评》不是李贽著作的考证[J]. *哲学研究*, 1980(4): 69–71.
- CUI Wenyin. On the textual research of *Commentary on The Four Books* is not Li Zhi's works[J]. *Philosophical Research*, 1980(4): 69–71.
- [32] 崔文印. 李贽《四书评》真伪辨[J]. *文物*, 1979(4): 31–34.
- CUI Wenyin. *Commentary on The Four Books* is not Li Zhi's works[J]. *Cultural Relics*, 1979(4): 31–34.
- [33] 吕祖谦. 宋文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 LU Zuqian. Song Wen Jian[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2.
- [34] 徐师曾. 文体明辨序说[M]. 罗根泽, 校点.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 XU Shizeng. The theory of style distinguishing and preface[M]. Luo genze, note.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8.
- [35] 祁承燾. 澹生堂藏书目[M]. 清宋氏漫堂钞本.
- QI Chenghan. Bibliography of Dan Sheng Tang[M]. Qing Dynasty Edition.
- [36] 王守仁. 传习录注疏[M]. 邓艾民, 注. 台北: 法严出版社, 2000.
- WANG Shouren. Notes to *Chuanxilu*[M]. Deng Aimin, note. Taipei: Fayan Press, 2000.
- [37] 曾枣庄. 中国古代文体学: 上卷[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 ZENG Zaozhuang.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stylistic: Volume 1[M].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2.

Analysis of the literary form of Li Chih's *Shuoshu*

QU Yankui, REN Jingz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19, China)

Abstract: *Shuoshu*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works by Li Chih, a late Ming thinker. Some scholars think that the literary form of *Shuoshu* is of eight-part-essay, and on this basis deduce Li Chih's attitude to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But the description of *Shuoshu* in some of Li Chih's relevant references such as *Fanshu* shows that the literary form of *Shuoshu* is not like eight-part-essay. The present essay, based on the description of *Shuoshu* in Li Chih's works, referring to his theory of childlike heart-mind (Tongxin Shuo) and his experience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as well as the mentality of scholar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adhering to the literary style of the existing articles in *Shuoshu*, the classification of academic works and comments by Gu Dashao and others, can safely conclude that the literary form of *Shuoshu* is "shuoshu". And Li Chih's *Shuoshu* should be named after its literary form. The analysis of the literary form of *Shuoshu* is helpful to study Li Chih's attitude to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then to study Li Chih's thoughts of Confucianism, stylistics, mental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Key Words: Li Chih; *Shuoshu*; literary form; shuoshu; eight-part-essay

[编辑: 胡兴华]